

有關「寶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Research on “Precious Scrolls”: A Review and Outlook

郭 武 (Guo Wu) *

「寶卷」是流行於明清民間具有說唱形式的宗教性文本，或者說是傳播宗教思想的文藝形式。因為具有宗教性質，所以有人將它看成是民間宗教的經卷，又因為具有說唱形式，也有人視其為說唱文學或民間曲藝之一種。事實上，寶卷是集宗教文本與文藝形式於一體的東西，兩者難以截然分開。寶卷的文本形式淵源於唐代佛教「變文」，而說唱活動（又稱「宣卷」或「講經」等）則與佛教「俗講」有關，其文本內容或直接宣講宗教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範，或借神話傳說、人物故事來渲染這種觀念和規範，其宣講形式則有韻有白、有曲有唱，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寶藏之一。19 世紀末以來，學界曾對寶卷進行過許多研究，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以下，試對相關成果進行梳理，指出其貢獻與不足，以圖有裨於學界的研究；淺陋之處，祈望方家教正！

一、早期有關「寶卷」研究的狀況

流行於民間的寶卷進入中國學界的研究視野，始於 20 世紀初主張「到民間去」的北京大學學人顧頡剛發表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並全文刊載《孟姜仙女寶卷》，¹後來鄭振鐸又發表〈佛曲敘錄〉並介紹了三十餘種寶卷，且在 1938 年出版《中國俗文學史》時單列「寶卷」一章，²開闢了有關寶卷的研究領域。而向達、李嘉瑞、孫楷第、佟晶心、吳曉鈴、傅惜華、杜穎陶、馬廉、趙景深等學者，也曾對寶卷的淵源、形式、內容等有過涉獵，或者對寶卷進行了搜集、整理、編目；當時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李世瑜，則利用田野調查所獲寶卷資料撰成了名著《見（現）在華北秘密宗教》。³這些都為後來的寶卷研究奠定了基礎。

國外漢學界對於寶卷的關注，據說最早始於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33 年在談論佛教的一篇文章中講述了《香山寶卷》的內容，後來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又曾於 1858 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做了一次關於「無為教」（羅教）的演講。⁴1903 年，荷蘭學者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運用福建地區的寶卷資料論述了「先天教」與「龍華教」。⁵日本學者關注寶卷大約始於 1930 年，當時大淵慧真赴中國搜集道教文獻曾順便得到了《東嶽

* 作者現為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特聘教授。本文感謝王家強、王孟博士幫助核對相關資料及其頁碼。

1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歌謠週刊》69（1924.11）：1-8；73（1924.12）：1-8。該《週刊》連載之《孟姜仙女寶卷》見 76-96（1925）。

2 鄭振鐸，〈佛曲敘錄〉，《小說月報》17「號外」（1927）；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頁 306-347。

3 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國立四川大學史學系聯合印行，1948）。

4 參閱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國外有關中國寶卷的研究〉，《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20）：51-59。

5 J. J. M. de Groot,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China, 1940 [1903]).

天齊仁聖大帝寶卷》等 10 種清刊寶卷。20 世紀 30 年代末，日本「財團法人國家調查機構」東亞研究所更派遣許多學者到中國進行民間宗教、信仰和民俗調查，而大淵忍爾、澤田瑞穗、吉岡義豐、窪德忠、倉田淳之助、高倉正三等學者亦曾在二戰期間赴中國搜集寶卷，所得大批寶卷文獻不僅豐富了日本國會圖書館及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筑波大學、東京大學、佛教大學等高校圖書館的收藏，也為後來日本的寶卷研究奠定了基礎。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寶卷研究曾一度沉寂。除了傅惜華等人所編之目錄彙編外，⁶80 年代前國內較有價值的成果唯李世瑜所撰兩文，指出寶卷實是「為流傳於民間的各種秘密宗教服務的」，但自清同治、光緒以後，「寶卷已由佈道發展為民間說唱技藝的一種」。⁷或許是由於中共建國初期的特殊氛圍，李世瑜的主張並未得到當時學界的回應，當時國內出版物皆對寶卷的宗教屬性避而不談，而將其視為說唱文學或民間戲曲之一種。⁸

與中國大陸的情況不同，國外學界對寶卷的研究，在 20 世紀 50 至 70 年代間得到了較大發展。如日本學者吉岡義豐、塚本善隆等人之論文，⁹認為寶卷具有強烈的「宗教傳道書」傾向，主張將其作為明清民間宗教的「經典」來進行研究，而澤田瑞穗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出版的《寶卷之研究》及其增補版本，則系統地討論了「寶卷的名稱」、「寶卷的系統」、「寶卷變遷」、「寶卷

的種別」、「寶卷的構造和詞章」、「寶卷和宗教」、「寶卷的體裁和文學性」、「寶卷的普及」等問題，同時對日本所藏兩百餘種寶卷撰寫了「提要」，成為當時研究寶卷的代表性著作。¹⁰澤田認為，寶卷直接繼承、模擬了唐宋以來佛教之「科儀和儀法的體裁及其演出法」，「為了進一步面向大眾和把某一宗門的教義加進去，而插入了南北曲以增加其曲藝性，這就是寶卷及演唱寶卷的宣卷」。¹¹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則於 1976 年出版《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運用寶卷資料來討論明清新興宗教；後來，歐大年又出版《寶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宗教經卷導論》等書，進一步強調了「寶卷」內容的宗教性，而比較忽視其中的表演性或文學性。¹²至於臺灣，則隨著 1973 年中央研究院開始整理所藏俗文學資料而出現了一陣研究寶卷的熱潮，唯其成果較多呈現為一些博碩士學位論文，¹³且這種熱潮一直持續至今。

二、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的趨勢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和思想禁錮的解除，中國大陸對於寶卷的研究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景象。而臺灣、國外與中國大陸學界交流的日益頻繁，也促進了這幾個區域有關寶卷研究水平的共同提高。總的來說，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寶卷研究趨勢，一是田野調查的展開和佚散寶卷的發現，二

6 傅惜華編，《寶卷總錄》（北京：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胡士瑩編，《彈詞寶卷書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李世瑜編，《寶卷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

7 李世瑜，〈寶卷新研——兼與鄭振鐸先生商榷〉，《文學遺產》增刊第 4 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 170-186；李世瑜，〈江浙諸省的宣卷〉，《文學遺產》增刊第 7 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頁 201-217。

8 如江蘇省音樂工作組編，《江蘇南部民間戲曲說唱音樂集》（北京：音樂出版社，1955）；葉德鈞，《宋元明講唱文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北嬰，《曲海總目提要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9 吉岡義豐，〈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寶卷流宗教の展開〉，《宗教文化》3（1950.7）：1-64；塚本善隆，〈寶卷と近代シナの宗教〉，《仏教文化研究》1（1951.6）：3-23。

10 澤田瑞穗，《寶卷の研究：總說・提要》（名古屋：采華書林，1963）；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11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頁 33。

12 Daniel L. Overm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aniel L. Overmyer,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13 如曾子良，「寶卷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5）；鄭志明，「明代羅祖五部六冊宗教寶卷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學位論文，1984）。

是館藏寶卷的發掘與大型叢書的編纂，三是有關寶卷發展歷史、內容形式及其社會影響的研究不斷深入。以下結合國內外的情況，略作分述。

（一）田野調查的開展和佚散寶卷的發現

作為文化人類學重要方法的田野調查，雖然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就已被李世瑜運用，但由於 1949 年後在中國大陸高校院系調整時未被納入建制，因此相關調查活動在中國停滯不前。而 80 年代以後有關寶卷和民間宗教研究的突破之一，即出現在田野調查領域，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揚州大學的車錫倫與山東大學的路遙。車錫倫通過長期對江蘇靖江、蘇州、無錫、常熟、張家港等地民間寶卷的搜集和對「宣卷」活動的調查，不僅發現了大批散存民間的寶卷文獻，而且還對相關活動作了詳細記錄和分析，發表數十篇論文，並出版了《中國寶卷研究》等煌煌巨著。¹⁴ 路遙則在長期研究義和團的基礎之上，於 1990 年率領團隊開始對山東、河北等地的民間秘密宗教展開大規模的田野調查，並利用所得寶卷文獻、口述資料等撰成《山東民間秘密教門》，¹⁵

為寶卷和民間宗教研究做出了貢獻。

此外，其他學者也紛紛對各地民間的寶卷文獻和「宣卷」活動展開調查，在《文化遺產》、《民俗研究》、《民間文化論壇》、《民間文藝季刊》、《民俗曲藝》（臺北）等刊物上發表了數十篇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並出版了一批著作，¹⁶ 顯示了寶卷研究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國外和臺灣的一些學者也常來中國大陸進行調查、搜集材料，並藉之撰寫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如 Stephen Jones 依據寶卷文獻和調查材料寫成的《採風：新舊中國時期鄉村音樂家的生活》，¹⁷ 歐大年關注近現代中國農村寺廟和廟會的著作《二十世紀中國北方的地方宗教：社區宗教儀式及信仰的結構及組織》，¹⁸ 以及臺灣學者丘慧瑩的論文等。¹⁹

田野調查不僅可以使我們獲得對「宣卷」活動的真切認識、瞭解文獻記載以外的很多信息，同時，還有機會「發現」佚散民間的寶卷文獻並對它們進行搜集整理。事實上，80 年代以來學者們也確實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搜集整理、編印出版了一批佚散民間的寶卷文獻。²⁰ 這些佚散民間的寶卷文獻之整理編印，不僅很好地保存

14 車錫倫，〈江蘇靖江的「講經」〉，《民間文藝季刊》第 3 輯（1988）：165-189；車錫倫，〈張家港市港口鎮「做會講經」調查報告〉，《民俗研究》2（2002.6）：52-61；車錫倫，〈江蘇「蘇州宣卷」和「同里宣卷」〉，《民間文化論壇》2（2007.4）：55-63；車錫倫，〈江蘇常熟地區的「做會講經」和寶卷簡目〉，《河南教育學院學報》6（2009.11）：1-8；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5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16 段平，《河西寶卷的調查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姜彬主編，《吳越民間信仰民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董曉萍、歐達偉，《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民眾》（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錢鐵民，《江蘇無錫宣卷儀式音樂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5）；李豫，《山西介休寶卷說唱文學調查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7 Stephen Jones, *Plucking the Wind: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Leiden: Chie Foundation, 2004).

18 Daniel L. Overmyer, *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Rituals and Beliefs* (Leiden: Brill, 2009).

19 丘慧瑩，〈江蘇常熟白茆地區宣卷活動調查報告〉，《民俗曲藝》169（2010.9）：183-247。

20 如車錫倫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段平編，《河西寶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吳根元等整理，《三茅寶卷》（江蘇省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靖江縣民間文學辦公室編印，1988）；郭儀、譚蟬雪等編，《酒泉寶卷（上編）》（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永昌文化局編，《永昌寶卷》（永昌：甘肅永昌文化局印，2003）；政協臨澤委員會編，《臨澤寶卷》（內部發行，2006）；梁一波主編，《河陽寶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王奎、趙旭峰搜集整理，《涼州寶卷》（武威：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管理處編印，2007）；張旭主編，《山丹寶卷》（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徐永成、崔德斌主編，《金張掖民間寶卷》（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宋進林、唐國增，《甘肅寶卷》（上海：中國書畫出版社，2008）；李中鋒、王學斌編，《民樂寶卷精選》（張掖：甘肅省民樂縣委員會，2009）；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主編，《中國沙上寶卷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常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社編，《中國常熟寶卷》（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5）。

了中華文化典籍、促進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且為學界提供了新的文獻材料，有力地推動了有關寶卷的研究。近年來，一些青年學者如曹新宇、李志鴻等，更在田野調查、搜集寶卷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²¹

（二）館藏寶卷的發掘與大型叢書的編纂

隨著學界研究寶卷的熱情不斷高漲，以及佚散民間寶卷的不斷發現，不少學者也開始關注各地圖書館或博物館秘藏的寶卷文獻，並不斷地利用編目等形式將其發掘出來。如 20 世紀 8、90 年代曾有〈揚州師院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北京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簡目〉等介紹國內圖書館收藏寶卷情況的文章問世，以及介紹國外和臺灣收藏情況的〈有關（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寶卷〉、〈世界宗教博物館搜藏的善書、寶卷與民間宗教文獻〉、〈劉文英寶卷考：附 SOAS 圖書館所藏寶卷目錄〉諸文。²²

21 世紀以後，這種「發掘」更加積極，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藏彈詞寶卷目》、車錫倫〈海外收藏的中國寶卷〉、關瑾華〈中山

圖書館藏粵版寶卷述略〉、霍建瑜〈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韓南所贈寶卷經眼錄〉、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寶卷〉、上田望《蘇州大學圖書館藏寶卷五種》、黃士忠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崔蘊華〈牛津大學藏中國寶卷述略〉、山下一夫〈日本廣島大學收藏宗教經卷的整理情況〉、洪淑苓〈臺灣民間所藏寶卷初探〉、郭臘梅《蘇州戲曲博物館藏寶卷提要》等俱屬此類。²³ 不僅如此，一些圖書館如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甚至將所藏寶卷文獻直接在網絡上公布出來。²⁴ 這些工作，為學界瞭解各地圖書館收藏寶卷的情況提供了很大幫助。

在搜集民間佚散寶卷並發掘圖書館典藏典籍的基礎上，不少學者又開始將各種寶卷彙編出版，從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寶卷文獻叢書，如中國大陸學者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40 冊、濮文起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20 冊、馬西沙主編《中華珍本寶卷》30 冊、車錫倫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15 冊，美國學者霍建瑜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寶卷彙刊》7 冊，以及臺灣學者王見川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12 冊、《明清民間宗教經卷

21 曹新宇，《祖師的族譜：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之一》（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16）；李志鴻，《閩浙寶卷與儀式研究》（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20）。

22 揚州師院圖書館流通部編，〈揚州師院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油印本（1988）；謝忠嶽，〈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世界宗教研究》3（1990）：54-66；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藏寶卷善本提要（三種）〉，《文教資料》4（1992）：96-99；李頂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寶卷簡目〉，《文教資料》2（1992）：96-107；相田洋、馮佐哲、范作申，〈有關（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寶卷〉，《世界宗教文化》3（1984）：34-40；王見川，〈世界宗教博物館搜藏的善書、寶卷與民間宗教文獻〉，《民間宗教》1（1995）：173-201；砂山稔，〈劉文英寶卷考：附 SOAS 圖書館所藏寶卷目錄〉，《Artes Liberales》58（1996.6）：35-45。

23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藏彈詞寶卷目》（北京：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2000）；車錫倫，〈海外收藏的中國寶卷〉，《中華文史論叢》63（2001）：176-184；關瑾華，〈中山圖書館藏粵版寶卷述略〉，《嶺南學》第二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3-179；霍建瑜，〈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韓南所贈寶卷經眼錄〉，《書目季刊》44：1（2010.6）：99-119；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寶卷——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補遺〉，《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1：3（2011）：255-260；上田望編，《蘇州大學圖書館藏寶卷五種》（金沢：金沢大學人間社會研究域，2011）；黃士忠、大木康主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崔蘊華，〈牛津大學藏中國寶卷述略〉，《北京社會科學》4（2015.4）：47-53；山下一夫，〈日本廣島大學收藏宗教經卷的整理情況〉，見王定勇主編，《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16），頁 107-113；洪淑苓，〈臺灣民間所藏寶卷初探〉，見王定勇主編，《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84-106；郭臘梅主編，《蘇州戲曲博物館藏寶卷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24 詳見「哈佛燕京圖書館寶卷特藏」（<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furyobunko/hokan.html>）。

文獻（續編）》12冊，曹新宇主編《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真·黃天道卷》7冊等；²⁵此外，王見川等主編《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編》1-3輯、《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中也收有一些寶卷。²⁶這些大型寶卷叢書的編纂出版，為相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材料基礎。

（三）有關寶卷發展歷史、內容形式及其社會影響的討論不斷深入

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還對寶卷的形成發展、內容形式及其社會影響進行了熱烈討論，取得豐富的學術成果。不過，各家看法也存在著分歧，以下略作梳理。

1. 寶卷的淵源、形成與發展

有關寶卷的淵源，雖然大多數學者認同早期鄭振鐸、李世瑜之源於佛教「變文」的說法，但澤田瑞穗則認為寶卷乃直接繼承和模仿唐宋以來佛教的「科儀和懺法的體裁及其演出法」。²⁷後來，車錫倫又繼之認為寶卷實源於佛教「俗講」，並多次重申這個觀點。²⁸但事實上，正如向達及冉雲華所言，「俗講」乃是一種講唱活動，而「變文」則是「記錄這種俗講的文字」，兩者其實是一體的。²⁹2010年，侯沖又指出以往學界認為佛教俗講是「專為啟發流俗的通俗講演」並不屬實，且經過考證後認為俗講

實際上是唐五代佛教在「三長月」舉行的一種敦勸俗人施財輸物的佛教法會，內容包括講經和受齋戒兩部分，且有專門的宗教儀式配合。³⁰其說令學界對寶卷的淵源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關於寶卷的形成時間，鄭振鐸先生曾因《香山寶卷》卷首題「宋崇寧二年天竺寺普明禪師編」而以為北宋時已有寶卷「實非不可能」。³¹20世紀中期李世瑜曾批評鄭氏這種說法，並以為寶卷名稱最早實見於明正德年間羅教（無為教）的《五部六冊》。³²80年代，馬西沙據新發現的《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歌寶卷》刊本中「金崇慶元年」（1212）及「至元庚寅」（1290）題識，而認為金元時期已經有了寶卷。³³至90年代，車錫倫則認為馬西沙所用刊本的題識應屬後人偽託，可靠的早期寶卷當係題識為明太祖「宣光三年」（1372）的抄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因此可以推論寶卷產生於元代；但與此同時，車錫倫又認為，由於《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與產生於南宋的《銷釋金剛科儀》演唱形態相同，「因此也可以說寶卷這種演唱形式形成於南宋時期」。³⁴後來，李世瑜維護其寶卷產生於明正德年間的說法，認為正德以前寶卷「其實從來就沒曾有過」³⁵；而侯沖則詳細列舉了新發現的早期寶卷及其內容，對李世瑜

25 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濮文起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馬西沙主編，《中華珍本寶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車錫倫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霍建瑜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寶卷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王見川、林萬傳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王見川、車錫倫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曹新宇主編，《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真·黃天道卷》（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13）。

26 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1-3輯（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11-2017）；王見川、李世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09）。

27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頁33。

28 車錫倫，〈中國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中國書目季刊》30：4（1997.3）：80-92；車錫倫，〈中國寶卷的淵源〉，《敦煌研究》2（2001.6）：132-138。

29 向達，《敦煌變文集·出版說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冉雲華，〈俗講開始時代的再探索〉，載饒宗頤主編，《敦煌文叢》（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頁115-130。

30 侯沖，〈俗講新考〉，《敦煌研究》4（2010.8）：118-124。

31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頁479。

32 李世瑜，〈寶卷新研——兼與鄭振鐸先生商榷〉。

33 馬西沙，〈最早一部寶卷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1986）：56-73。

34 車錫倫，〈中國最早的寶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996）：45-52。

35 李世瑜，〈民間秘密宗教與寶卷〉，《曲藝講壇》5（1998）。

的說法予以了批評，³⁶韓秉方更在考察北宋時期觀世音信仰與妙善傳說的關係之基礎上，而肯定早期的鄭振鐸之北宋說「恰好就是歷史真像」。³⁷總之，雖然諸家看法不盡一致，但其深入辨析卻推動了寶卷研究的發展。

至於寶卷的發展歷程，60年代李世瑜編《寶卷綜錄》曾指出在明萬曆、崇禎時期蔚為極盛，至清康熙後轉為式微，但卻一直流傳至民國初年；其間，清光緒、同治以後寶卷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即「由佈道勸善發展為民間說唱技藝之一」，內容以演唱故事為主，多數已經是純粹的文學作品。90年代濮文起基本承襲了李世瑜的看法，但又指出清道光後民間教團中曾出現過一種名為「壇訓」的經卷，內容均為扶鸞乩語。³⁸車錫倫則進一步認為：明代前期的寶卷是「世俗佛教寶卷發展時期」，內容多為講經與說因緣故事；明中葉以後到清康熙年間是「民間寶卷發展時期」，內容多為宣講教義、修持方式與宗教活動儀軌，也有一些改編神道故事和民間傳說故事；清末，各地民間教團又盛行「鸞書寶卷」（壇訓）。此外，清代初年「宣卷」活動已流入南北各地民間，「成為民眾信仰、教化、娛樂活動，因此民間寶卷盛行」。³⁹綜觀各家，有關寶卷發展趨勢的說法大體一致，即都認為寶卷有一個由「宗教」向「世俗」發展的過程，只不過諸家對這個「轉折」的時間點（清末

或清初）之認識不同罷了。但這種看起來順理成章的「趨勢」卻蘊含著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如果寶卷在清代已經成為「民眾」而非「信徒」的活動，甚至完全「發展為民間說唱技藝之一」，則為何清末還會出現宗教神秘色彩極其濃厚的、通過扶鸞降神而得的「鸞書寶卷」（壇訓）？

此外，有關早期羅教經典《五部六冊》的版本研究，以及對某些寶卷刊刻年代之真偽的討論，也是近年一些學者關注的熱點，如王見川、曹新宇等人曾在這方面頗有貢獻。⁴⁰

2. 寶卷的內容與形式

80年代以後關於寶卷之內容、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從宗教、文藝的視角切入，後來才漸有總體上的討論。宗教學研究者關注的，多屬寶卷蘊含的教派歷史、教義思想、修持儀軌等內容，且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進行：一是從總體上審視「民間宗教」或「秘密結社」，二是專門討論某一教派或某部寶卷。當時對民間宗教的總體研究，大陸學界以喻松青首開其風，⁴¹後來濮文起、馬西沙等、秦寶琦、王熙遠及喻松青、路遙等人的著作則屬代表性成果。⁴²此外，港臺學者戴玄之、鄭志明、黎志添與西方學者石漢椿（Richard Hon-chun Shek）、歐大年等，也有這方面的經典之作。⁴³

36 侯冲，〈早期寶卷並非白蓮教經卷——以《五部六冊》徵引寶卷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1（2015.2）：102-108。

37 韓秉方，〈觀世音信仰與妙善的傳說——兼及我國最早一部寶卷《香山寶卷》的誕生〉，《世界宗教研究》2（2004.6）：54-61。

38 濮文起，〈寶卷學發凡〉，《天津社會科學》2（1999.4）：78-84。

39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頁3-25。

40 王見川，〈《五部六冊》刊刻略表〉，《民間宗教》第一輯（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161-171；王惠琛，〈現存德化堂手抄《五部六冊》版本初探〉，見范純武編，《善書、經卷與文獻》第一輯（新北：博揚文化公司，2019），頁79-90；侯冲，〈早期寶卷並非白蓮教經卷——以《五部六冊》徵引寶卷為中心的考察〉；王見川，〈民間宗教經典的年代與真偽問題：以《九蓮經》《三煞截鬼經》為例〉，《清史研究》1（2015.2）：109-117；曹新宇，〈新發現「成化禁書」與白蓮教的關係——兼答王見川教授問題〉，《清史研究》1（2015.2）：118-125。

41 喻松青，〈明清時期的民間宗教信仰和秘密結社〉，《清史研究集》第1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頁113-153。

42 濮文起，《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喻松青，《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43 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鄭志明，《臺灣民間宗教結社》（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1998）；黎志添，《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集》（香港：學峰文化出版社，1999）；Richard Hon-chun Shek,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late Ming: Sectarianism and Popular Thought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80); Daniel L. Overmyer, *Precious Volumes*.

8、90年代間對於某一教派或某部寶卷的專門研究，多表現為單篇的論文，如中國大陸馬西沙、韓秉方，臺灣學者王秋桂、鄭志明，⁴⁴日本學者大部理惠、淺井紀以及加拿大學者那原道（Randall L. Nadeau）諸文。⁴⁵隨著馬西沙、徐小躍、韓秉方等專著出版，⁴⁶相關研究更加得到了深化。前述曹新宇、李志鴻等青年學者基於田野調查而出版的新著，則進一步豐富了學界的認識。

文藝視角則更多地關注寶卷的外在形式，如文體變化、演唱形態、儀式結構、音樂類型等。這方面的研究也以單篇論文為主，較早涉獵者實是王秋桂，其〈從寶卷到歌謠：以孟姜女故事的兩種版本為例來研究文學改編〉，依據不同版本的《孟姜女寶卷》討論了文本之間的「改寫」問題。⁴⁷中國大陸學者在這方面取得研究進展則是在21世紀以後，如以車錫倫為代表的許多學者通過文獻分析和田野調查，而將寶卷及其演唱形式呈現

給了學界。⁴⁸而董曉萍、陳平原、錢鐵民、慶振軒等人的專著出版，⁴⁹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相關研究的系統化。

隨著對寶卷內容和形式研究的不斷深化，以總體之寶卷作為研究對象的著作也開始出現。如車錫倫曾於1997年出版《中國寶卷概論》，並在修訂《中國寶卷總目》的基礎上，連續推出了個人專著，還與其他學者合作出版了《靖江寶卷研究》、《吳方言區寶卷研究》、《北方民間寶卷研究》等。⁵⁰此外，其他一些學者也出版過關於區域寶卷的研究作品。⁵¹不過，或許是由於寶卷的內容和形式過於龐雜，這類以總體之寶卷作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尚未能全面地做出深入研究。

此外，與寶卷內容形式研究相關的一個問題，即歷史上各種寶卷應該如何分類。對於這個問題，民國時期率先研究寶卷的鄭振鐸以為可分為「佛教的」與「非佛

- 44 馬西沙，「清前期八卦教初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碩士論文，1982）；韓秉方，〈羅教「五部六冊」寶卷的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4（1986）：34-49；C. K. Wang（王秋桂），「The Hsiao-shih Meng Chiang Chung-lich Chen-chieh Hsien-liang Paochian」，《Asian Culture Quarterly》vol.7, no.4（1979）；鄭志明，「明代羅祖五部六冊宗教寶卷思想研究」。
- 45 大部理惠，〈中國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結社の教義に關する考察：黃天道の寶卷を中心として〉，《言語・地域文化研究》2（1996.3）：177-204；淺井紀，〈黃天道とその寶卷〉，《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67（1997.9）：1-19；Randall L. Nadeau，「Popular Sectarianism in the Ming: Lo Ch'ing and His 'Religion of Non-Action'」（Ph.D.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0）。
- 46 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徐小躍，《羅教·佛教·禪學：羅教與〈五部六冊〉揭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韓秉方，《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47 C. K. Wang，「From Pao-chian to Ballad: A Study in Literary Adaptation as Exemplified by Two Versions of the Meng Chiang-niu Story」，《Asian Culture Quarterly》9-1（1981）：48-65。
- 48 車錫倫，〈寶卷中的俗曲及其與聊齋俚曲的比較〉，《蒲松齡研究》3-4（2000）：370-378；車錫倫，〈明清教派寶卷的形式和演唱形態〉，見《2001海峽兩岸民間文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2001）；車錫倫，〈明清民間教派寶卷中的小曲〉，《漢學研究》20：1（2002.6）：189-220；尹虎彬，〈河北民間表演寶卷與儀式語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3（2004.8）：78-85；薛藝兵，〈河北易縣、涑水的《后土寶卷》〉，《音樂藝術》2（2000.6）：31-37；陳泳超，〈故事演述與寶卷敘事——以陸瑞英演述的故事與當地寶卷為例〉，《蘇州大學學報》2（2011.3）：151-157；張靈，〈寶卷對小說的改編及其民間文學特徵的彰顯〉，《文學評論》2（2012.3）：209-217；王文仁，〈河西寶卷的曲牌曲調特點〉，《人民音樂》9（2012.9）：65-67；張馨心，〈河西寶卷與河西講唱文學關係——以《方四姐寶卷》為例〉，《敦煌學輯刊》1（2013.3）：79-84；李貴生、王明博，〈河西寶卷說唱結構嬗變的歷史層次及其特徵〉，《社會科學戰線》11（2015.11）：103-109。
- 49 董曉萍、歐達偉，《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民眾》；陳平原，《現代學術史上的俗文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錢鐵民，《江蘇無錫宣卷儀式音樂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5）；慶振軒，《河西寶卷與敦煌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0 車錫倫，《中國寶卷概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7）；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車錫倫、陸永峰，《靖江寶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陸永峰、車錫倫，《吳方言區寶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尚麗新、車錫倫，《北方民間寶卷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51 劉永紅，《西北寶卷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劉永紅，《青海寶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教的」兩類，而李世瑜則認為寶卷乃是民間宗教經卷，故可按其內容分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襲取佛道經文或故事以宣傳秘密宗教的」、「雜取民間故事傳說或戲文的」三大類。澤田瑞穗又認為寶卷可分為「科儀卷」、「說理卷」、「敘事卷」、「唱曲卷」、「雜卷」五大類。20世紀90年代以後，那原道發表文章認為：無論寶卷的產生年代或形式如何，所有寶卷的演出都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⁵²總之，有關寶卷的分類問題，諸說可謂五花八門，各有其道理但也有明顯漏洞，有待今後加強研究。

3. 寶卷的社會影響和作用

有關寶卷的社會影響，早期多在民間宗教研究著作中被提及。後來，一些論文也開始專門探討寶卷與文學藝術、民間風俗、道德教化、農民運動以及語言、婦女、經濟等的關係，同時也有學者從社會功能、文化生態等角度來談論之。

80年代後學界在這方面關注最多的問題，是寶卷與文學藝術的關係，這或許與寶卷本身具有文藝形式有關。

其中，劉蔭柏、車錫倫、楊振良、高國藩、韓秉方諸文，屬於這方面較有影響的作品，而澤田瑞穗著《中國的庶民文藝：歌謠、說唱與演劇》亦涉及了寶卷文獻。⁵³後來的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圍繞《西遊記》、《金瓶梅》等名著展開，似無太多新意，唯李武蓮、柳旭輝、楊永兵、孫鴻亮、丁一清等文，在寶卷與地方文藝的關係上貢獻了不少新的材料。⁵⁴

這一時期學者關注較多的另一問題是寶卷對於勸善、民俗的影響，如周謙、劉守華、陸永峰、尚麗新以及韓國學者李浩裁諸文，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這層關係。⁵⁵而姜彬、劉禎、黃靖及香港學者游子安等著作，⁵⁶也不不同程度地論述了寶卷對於勸善、民俗的影響。

農民運動與寶卷的關係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討論，如李濟賢、李豫等兩文。⁵⁷不過，與20世紀5、60年代不同，此時學界關注的問題除了「起義」本身，還有寶卷內容與政治治亂的關係，如吳昕碩、歐陽小玲兩文。⁵⁸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國外學者的興趣似乎比中國濃厚，

52 Randall L. Nadeau, "Genre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Pao-chüa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1993): 121-128.

53 劉蔭柏，〈《西遊記》與元明清寶卷〉，《文獻》4（1987.12）：48-62；車錫倫，〈《金瓶梅詞話》中的宣卷〉，《明清小說研究》3-4（1990.12）：360-374；楊振良，〈孟姜仙女寶卷所反映的民間故事背景〉，《漢學研究》8：1（1990.6）：135-147；高國藩，〈論抄本《金山寶卷》的發現和它在白蛇傳研究中的價值〉，《中韓文化研究》第3輯（大邱：中文出版社，2000）；韓秉方，〈《香山寶卷》與中國俗文學之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3（2007.9）：77-85；澤田瑞穗，《中國的庶民文藝：歌謠（うた）・說唱（かたりもの）・演劇（しばい）》（東京：東方書店，1986）。

54 李武蓮，〈涼州寶卷淵源及其藝術特色〉，《絲綢之路》10（2009.5）：87-88；柳旭輝，〈娛樂的儀式——河西寶駝念唱活動的意義闡釋〉，《中國音樂學》2（2012.4）：60-65；楊永兵，〈山西永濟道情寶卷文本研究初探〉，《中國音樂》3（2012.7）：116-119；楊永兵，〈山西河東地區寶卷及音樂研究〉，《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2012.5）：94-102；孫鴻亮，〈山西介休寶卷與陝北說書〉，《安康學院學報》4（2013.8）：53-56；丁一清，〈西北寶卷與明清小說傳播〉，《哈爾濱師範大學學報》3（2014.10）：107-109。

55 周謙，〈民間泰山香社初探〉，《民俗研究》4（1989.12）：39-42；劉守華，〈從寶卷到善書：湖北漢川善書的特質與魅力〉，《文化遺產》1（2007.11）：80-85；陸永峰，〈論寶卷的勸善功能〉，《世界宗教研究》3（2011.6）：163-172；尚麗新，〈《黃氏女寶卷》中的地獄巡遊與民間地獄文化〉，《古典文學知識》6（2013.11）：83-87；李浩裁，〈韓祖廟會中的宗教文化表現〉，《民俗研究》1（2006.3）：185-193。

56 姜彬，《吳越民間信仰民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7）；黃靖，《寶卷民俗》（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3）；游子安，《勸化金籤：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

57 李濟賢，〈徐鴻儒起義新探〉，《明史研究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265-289；李豫、李雪梅，〈《趙二姑寶卷》與清代山西叩關大案〉，《山西檔案》3（2003.6）：38-41。

58 吳昕碩，〈中國明清時期的黃天道：宗教與政治層面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宗教所碩士論文，2005）；歐陽小玲，〈民間宗教寶卷與政治鬥爭〉，《雲南檔案》11（2012.11）：24-26。

如美國學者韓書瑞（Susan Naquin）的兩本著作，⁵⁹ 乃屬具有創見的精耕細作成果，經過深入考辨後以為：民間宗教運動不是清代本身的社會危機引發的，起義的內在動因乃在於民間宗教教派對「千年王國」的信仰，及其組織內部所具有的動力。後來，劉平又從文化的角度入手，探討了農民運動的文化因素和宗教因素。⁶⁰

此外，一些文章還對寶卷與語言、婦女、經濟及不同宗教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討論，如程瑤、張國良屬於語言方面，⁶¹ 劉永紅、張萍屬於婦女方面，⁶² 丘麗娟屬於經濟方面，⁶³ 而周育民、釋見曄則屬於宗教間關係。⁶⁴ 近期曹新宇的新著，又涉及了家庭（夫婦）、宗族、村落、地域（衛所）等問題。這類討論的數量較少，但卻為我們研究寶卷文獻提供了新的視角。

除了上述角度外，一些學者還試圖綜合地審視寶卷及民間宗教的影響，如王爾敏、濮文起等文章，⁶⁵ 以及鄭志明、宋光宇、車錫倫、李永平等著作。⁶⁶ 這種綜合性的討論，頗有助於我們在總體上認識寶卷及其影響。

三、有關「寶卷」研究之不足及展望

如上所述，有關寶卷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不僅大量的寶卷文獻被編纂出版，而且相關的學術討論也不斷深入，這為今後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不過，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在以下方面仍有發

展空間：

（一）有關寶卷的性質與分類

1. 學科專業的樊籬與寶卷性質之爭論

以往有關寶卷研究的一個不足，是學者們多只從自己的學科背景、專業角度出發來對寶卷的性質各自表述，以致相關認識頗顯矛盾。這種矛盾，主要來自文學與宗教學兩個領域，如接受文學訓練的車錫倫強調寶卷是一種「說唱文本」，而從事宗教學研究的濮文起則繼承其師李世瑜觀點，將寶卷視為一種「宗教經典」。雖然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亦在分別「認定」寶卷是「說唱文本」或「宗教經典」之後，同時表示寶卷還有其他屬性（如宗教或文學），但若從其研究成果對於寶卷內容的關注重點來看，「文學」與「宗教」之間的藩籬是很明顯的。而事實上，偏執於寶卷的「宗教」或「文學」屬性都是不對的，因為從內容上來說，寶卷宣揚的確實是各種宗教教派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範，而從形式上來說，寶卷採用的卻是民間說唱等文藝形式。內容和形式都是組成一個事物的必要條件，兩者應該是統一的，而不可截然分離。以往學者產生偏執的原因，不僅是由於學科專業的限制，更在於割裂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鑑於此，我們應該融合不同的學科和專業，自覺地從別的學科專業來審視研究對象、考慮相關問題，以求避免盲人摸象的尷尬。

59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0 劉平，《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61 程瑤，〈河西民間宗教寶卷方俗語詞的文化蘊藉〉，《漢語學報》2（2015.4）：82-88；張國良，〈寶卷俗字筭記〉，《古漢語研究》2（2015.5）：11-15。

62 劉永紅，〈二元對立與狂歡：河西寶卷中的女性人類學解讀〉，《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2：1（2011.5）：18-21；張萍，〈明清時期秘密教門的婦女觀——對《血湖寶卷》的釋讀〉，《甘肅理論學刊》5（2013.9）：187-192。

63 丘麗娟，〈設教興財：清乾嘉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0）。

64 周育民，〈一貫道前期歷史初探：兼談一貫道與義和團的關係〉，《近代史研究》3（1991.6）：75-87；釋見曄，〈以羅祖為例管窺其對晚明佛教之衝擊〉，《東方宗教研究》5（1996.10）：115-134。

65 王爾敏，〈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之生態環境與社會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981.7）：33-59；濮文起，〈寶卷研究的歷史價值與現代啟示〉，《中國文化研究》4（2000.12）：116-121。

66 鄭志明，《中國社會與宗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宋光宇，《天道傳燈：一貫道與現代社會》（臺北：臺北三陽印刷公司，1996）；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李永平，《懷災與記憶：寶卷的社會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或許是為了破除上述樊籬，近年也有學者主張從「多元」的角度審視寶卷，如尚麗新認為寶卷具有「多元化的學科歸屬」，「既是一種集音樂與文學於一體的講唱藝術，又是民間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的表達方式，同時更是民間社會生存、生活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⁶⁷這種提倡「多元」的主張是可取的，但遺憾的是，尚麗新在研究實踐中並未能真正貫徹其合理主張，而是同樣顯示出了「偏執」的一面，如其自稱在編輯《寶卷叢抄》時採用了「簡化處理的方法」，「在內容上也更重視故事性，並不十分看重它們在宗教寶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⁶⁸不僅如此，尚麗新還在與車錫倫的合著中對甘肅「河西寶卷」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表示非議，認為應該對其中所謂「教派寶卷」與「民間寶卷」進行嚴格區分，「有選擇、有條件」地來申報「非遺項目」。⁶⁹應該說，這種偏執非但有損全面地把握寶卷之總體，而且有礙深入地理解寶卷之性質；由此，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可以探討的空間。

2. 寶卷如何分類還是一個難題

與對寶卷之內容形式的認知不同有關，學界關於寶卷分類的說法也有很多分歧。如前所述，鄭振鐸和李世瑜的分類有所不同。⁷⁰20世紀90年代，車錫倫又提出了如下新的分類方法：從歷史發展時期來說，寶卷可以清康熙年間為界分為前期的「宗教寶卷」與後期的「民間寶卷」兩大類；其中，前期的「宗教寶卷」又可以明正德年間為界劃分為「佛教世俗化寶卷」、「民間宗教寶卷」兩小類，而後期的「民間寶卷」則可分為「勸世文」、「祝禱儀式」、「講唱故事」、「小卷」四小類。與此同時，

他又把前後兩個時期的「講唱因緣」和「講唱故事」幾種單獨提出而列為一大類，再分其為「神道故事」、「婦女修行故事」、「民間傳說故事」、「俗文學傳統故事」和「時事故事」五小類。不僅如此，他還按照內容和題材，將寶卷分為「文學寶卷」和「非文學寶卷」兩大類。⁷¹至於國外的許多學者，則多能跳出以「教派」來劃分寶卷類型的窠臼，如前述澤田瑞穗與那原道即是如此。

或許是由於相關研究成果數量頗多，車錫倫的「宗教寶卷」與「民間寶卷」分類方法在學界影響很大。⁷²但如果對這種頗顯複雜的說法詳加考察，不難發現其主要架構實是揉合李世瑜與鄭振鐸的兩種說法而來，而作為集大成者的車錫倫所做「揉合」卻難言是成功的。且不說他將幾種標準共用、不同層次相混可能令讀者產生理解困難，僅其對鄭、李兩種說法的「吸取」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如下：首先，鄭振鐸所謂「佛教的」實際上是對寶卷這種特殊文本的性質之誤判，因為很多民間宗教教派在創立和發展時皆曾大量吸收過佛教、道教的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將其視為佛教或道教的支系；對於這些文本，李世瑜將它們視為「襲取佛道經文或故事以宣傳秘密宗教」是合理的，而車錫倫繼鄭振鐸而來的「佛教世俗化寶卷」之看法，則屬早期學界尚少關注和瞭解「民間宗教」這一領域的認識結果。其次，雖然李世瑜所謂清代以後的「雜取民間故事傳說或戲文的」類型寶卷具有濃厚的民間文藝色彩，甚至已經「由佈道勸善發展為民間說唱技藝之一」，但它們仍然屬於民間宗教的文本，故不能冠以「民間寶卷」之名而與「宗教寶卷」並列。「民間寶卷」與「宗教寶卷」這兩個概念（名

67 尚麗新，《寶卷叢抄·前言》（太原：三晉出版社，2018），頁1。

68 尚麗新，《寶卷叢抄·前言》，頁3。

69 尚麗新、車錫倫，《北方民間寶卷研究》，頁422。

70 詳請參閱李世瑜撰《寶卷新研》及〈江浙諸省的宣卷〉兩文。此外，李世瑜還在《寶卷綜錄》中說寶卷有「前期」與「後期」之分，並以同治光緒之前「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襲取佛道經文或故事以宣傳秘密宗教的」兩類為前期，而以同治光緒之後的「雜取民間故事傳說或戲文的」為後期。

71 車錫倫，〈中國寶卷的發展、分類及其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1996）。

72 如主張寶卷是「宗教經典」的濮文起在最近出版的《寶卷研究》之「序」中也襲用車說，以為有「前期寶卷」（或「宗教寶卷」）、「後期寶卷」（或「民間寶卷」）之分。詳見濮文起、李永平編：《寶卷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2。

稱)並列,顯示它們具有一定的對立(互斥)性,但事實上所謂後期的「民間寶卷」文本中又有大量內容與所謂「宗教寶卷」相同,故兩者在邏輯上是不能「並列」的。正如筆者曾問:如果寶卷在清代已經成為「民眾」而非「信徒」的活動,則為何清末還會出現宗教神秘色彩極濃的、通過扶鸞降神而得的「鸞書寶卷」(壇訓)?事實上,車錫倫所謂「民間寶卷」同樣具有明顯的宗教元素,而據近年濮文起、李志鴻等人的調查研究,民國以來仍有不少宗教色彩濃厚的寶卷問世,且其「宣卷」實也伴有大量的宗教儀式。⁷³由此,可知如何對寶卷進行分類還是一個難題,需要我們繼續思考和探索。

(二) 有關寶卷的集成與編纂

近年不少學者將各種寶卷彙編出版,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寶卷文獻叢書。目前已經出版的寶卷文獻,除了一些地方性彙編本如前述,還有幾部大型的寶卷叢書,詳如下表:

編者	書名	冊數	種數
張希舜等	《寶卷初集》	40 冊	152 種
濮文起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	20 冊	361 種
馬西沙	《中華珍本寶卷》(前三輯)	30 冊	137 種
車錫倫	《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	15 冊	77 種
霍建瑜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寶卷彙刊》	7 冊	86 種
王見川等	《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及續編)	24 冊	414 種
曹新宇	《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真·黃天道卷》	7 冊	70 種

綜觀以上寶卷叢書,共收書逾 1,200 種,但有書名、版本重複情況,實際數量尚待進一步統計。而據車錫倫言,目前已知寶卷數量約 1,500 種,逾 5,000 版本,故

知寶卷叢書缺收不少。此外,近年陸續有文章指出車氏《總錄》遺漏,如周曉蘭〈《中國寶卷總目》補遺〉言福建師大圖書館藏有 60 餘種寶卷未見《總錄》著錄;⁷⁴若再加上民間散佚的寶卷文獻,則上述「寶卷叢書」缺收的寶卷數量更多。因此,繼續搜集缺收寶卷文獻,並對所有寶卷加以精心整理、集成編纂,仍然有著很大的拓展空間。

(三) 有關寶卷的功能與作用

所謂寶卷的功能和作用,涉及的實際上是寶卷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問題。由前所述,可知學界對寶卷與文學藝術、民間風俗、道德教化、農民運動關係的討論較多,而對其他方面如方言俗字、女性問題、經濟利益、宗教關係等的研究則較少。至於從總體上、理論上來探討寶卷功能和作用的成果,更屬鳳毛麟角。研究較少的領域固然是需要大力發展的方面,而以往討論較多的問題,也同樣有著很大拓展空間。略如下述:

1. 關於寶卷與文學藝術關係的研究

以往學界關於寶卷與文學藝術關係的研究成果雖然較多,但卻主要集中於《西遊記》、《金瓶梅》與《孟姜仙女寶卷》、《香山寶卷》等著名作品,以及山西、河北兩省的地方文藝,而較少關注其他文學作品和地方文藝。事實上,明清寶卷與中國文藝的關係,絕不僅限於這幾部作品與這兩個省份,如何更加廣泛、全面地挖掘其他作品和其他地方的材料並加以深入研究,乃是今後研究獲得突破的關鍵問題。

2. 關於寶卷與民間風俗、道德教化關係的研究

關於寶卷與民間風俗、道德教化關係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典型代表為黃靖、酒井忠夫以及游子安諸書。黃靖從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社會組織、江湖民俗、人生禮儀、信仰民俗、民間語言民俗等很多方面,對寶卷展現出的「民俗」進行了全面描述,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翔

73 濮文起,〈當代中國民間宗教活動的某些特點——以河北、天津民間宗教現實活動為例〉,《理論與現代化》2(2009.3):75-80;
李志鴻,《閩浙贛寶卷與儀式研究》,頁 187-263。

74 周曉蘭,〈《中國寶卷總目》補遺〉,《唐山學院學報》25:1(2012.1):34-37。

實的資料。不過，黃靖似乎尚未能很好地把握「民俗」的內容，《寶卷民俗》一書描述的也更多地是屬於「社會生活」或「日常生活」範圍，而對一些積澱甚久的活動如歲時風俗、民間廟會等則幾乎沒有涉及，同時也缺乏對全國各地民俗的調查，這不能不說是遺憾！而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與游子安的著作雖可謂是研究明清善書的經典之作，且皆有專章涉及民間宗教和寶卷，對其勸善教化的內容予以了較好介紹，但兩人關注的重點都是「善書」作為一個整體的情況，而無暇對作為一個部分的民間宗教寶卷之特殊作用進行探究，更沒有對民間宗教寶卷與儒釋道「善書」的關係及其對「三教合流」的影響展開討論。因此，結合寶卷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系統深入地發掘寶卷對中國民風民俗的影響，尤其是探討寶卷在道德教化方面的特殊作用、與儒釋道「善書」的關係及對「三教合流」的影響，乃是今後學界可以取得突破的方向。

3. 關於寶卷與農民運動／政治穩定關係的看法

20 世紀 5、60 年代的中國學界曾熱烈討論過宗教與農民運動（起義）的關係，但近年學界關注的問題除了「起義」本身，還有寶卷內容與政治治亂的關係。這方面的代表作品韓書瑞和劉平的研究，對 5、60 年代中國學界強調經濟基礎的做法可謂是一種修正，但同時也將民間宗教推向了一種在強調「政治」之現實中國的困難處境。只不過，劉平在書中又表示：農民叛亂乃是一種內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宗教因素只是促成叛亂

的「橋樑」，而文化因素也僅是其中的一個非根本因素，它們與叛亂沒有必然的關係。⁷⁵ 如此，則寶卷究竟在中國政治的治亂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對下層社會之穩定和諧的影響究竟如何，也就成了今後仍需繼續討論的問題。

4. 關於寶卷與方言俗字、女性問題、經濟利益關係等的研究

如前所述，學界目前關於寶卷與方言俗字、女性問題、經濟利益、宗教關係等的研究成果很少，所以研究這幾個方面的問題在今後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其中，尤以寶卷與佛教、道教的關係屬於亟待加強研究且具有發展空間的問題。至於寶卷與家庭、宗族、村落、地域等的關係，更是一些新提出來的問題。

此外，從綜合的角度來討論寶卷及民間宗教的影響，也是近年學界努力的一個方向。不過這方面的著作不多，目前僅有王爾敏、濮文起等文章，以及車錫倫、李永平等著作。其中，車錫倫與李永平屬於專門探討寶卷功能的著作，前者從信仰、教化、娛樂三個角度進行歸納，後者則從「禳災」角度予以補充，可謂較好地把握住了寶卷的主要特點。不過，這種綜合性的討論還遠不夠全面和深入，如前述「治亂」、「經濟」、「女性」、「宗教」等問題，也屬寶卷功能的組成部分，應該加以充分考慮和深入討論。總之，有關寶卷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在很多問題上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需要今後繼續加以探討。

75 劉平，《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頁 342-349。